

陈志华 著



建筑文库

北窗集



· 建筑文库 ·

北 窗 集

陈志华 著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5 号

• 建筑文库 •

杨永生 主编

北 窗 集

陈志华 著

*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密云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frac{3}{4}$ 字数: 218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一版 199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 600 册 定价: 4.55 元

ISBN7—112—01876—5/TU·1421

(6901)



陈志华

陈志华同志，1929年生于浙江，1947年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49年转入清华大学建筑系，1952年毕业，现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陈先生在整整40年的教书生涯中，讲授过外国古代建筑史、苏维埃建筑史、建筑设计初步、外国造园艺术、文物建筑保护等。

他的主要著作有《外国建筑史》、《外国造园艺术》等，还翻译了《俄罗斯建筑史》、《建筑艺术》、《走向新建筑》、《风格与时代》等书。此外，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约100万字的学术论文、科普文章、评论文章、杂文随笔等。

这本集子里的30篇文章，就是从这百余篇文章中选出来的。它们涉及到建筑风格、传统与创新、文物建筑保护、园林等方面的问题。

陈志华教授是我国建筑界多产的作家、翻译家。

编者的话

我读到陈志华先生的文章，那还是10多年前《建筑师》丛刊刚刚创办不久的时候。记得，王伯扬同志告诉我：“陈先生说，建筑评论性的杂文，我是敢写的，你们《建筑师》敢登吗？”那时，我虽已不是初生的牛犊，因为“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了，也就不怕虎了。于是，放开胆子说：“伯扬，请你转告陈先生，他敢写，我们就敢登”。就这样，陈先生一发而收不住，以寒武为笔名，在《建筑师》的北窗杂记专栏里连续发表了不少文章。他的这些杂文，在读者中间引起了反响，许多人纷纷打听寒武是谁。尽管那时对陈先生文章中的个别提法，我也有不同看法，但是没有改动删节，依然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去做了。况且，有些观点还没经过实践的检验，谁知道哪个正确。

编入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涉及的问题都是近10多年来建筑界的热门话题，但他的论述、争辩又不是圈子建筑学，而是把这些问题摆在文化、历史、思想等十分广阔的领域里，多方位地去论证自己那些毫不含糊的观点。这些雄辩的文章都浸透着作者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建筑事业的心血。没有执着的追求，是写不出这些文情并茂的文章的。

陈志华先生博学智睿，笔锋犀利，读来绝不乏味。他在学建筑之前，在清华攻读过文科，他的文笔生气流动，

绝非死笔呆文。

或许有人看惯了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文章，觉得陈先生的某些观点有些偏颇，某些文字有些尖刻，心里不那么舒坦。我还是奉劝大家耐着性子读下去，细细地品味，也许会有不小的收获。

杨永生

1992年8月

小 序

我的写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之前。那时候，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写了一部将近50万字的《外国建筑史》^{〔1〕}，翻译了苏联的《建筑艺术》、《俄罗斯建筑史》和《古典建筑形式》^{〔2〕}。1959年，为配合“国庆工程”，写了一篇《国外剧场建筑发展简史》，放在《国外剧场建筑图集》^{〔3〕}前面，还翻译了一本《城市纪念性装饰雕刻》。教学之余，还写了些普及性的小文章，题材比较杂，甚至凑趣写些电影和戏剧评论之类的文章。这些零散文章，在“文化大革命”时被当作罪证，由工宣队取走，没有还我。现在只剩下一篇，还是一位学生保存的剪报，送了我。

“文革”期间，写了几十万字的检查交代，数量惊人。有一些写得很离“谱”，例如，在大赦战犯之后，工宣队教育我，说我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比战犯还坏得多，不要妄想侥幸过关。事后，我又奉命把这次教育的认识写下来。我写得很开心，一个劲地“上纲上线”，“砂子”们赞了我一声：态度老实。其实，我之所以那样写，乃是因为

〔1〕 建筑工程出版社1960年出版。

〔2〕 这三本书都是建筑工程出版社1955年出版。

〔3〕 清华大学出版，1960年。

态度极不老实。我根本不相信那种反动统治能长久，根本不相信那种政治状况是正常的。写就写，反正将来不过是笑话。可惜，这10年的“写作”不能列入我的写作生涯中去。

第二个时期要从“文化大革命”结束算起，到1989年，也就是正好整个80年代。这个时期的写作题材比较多，方面比较广，也有兴趣在文体和文风上作些尝试，变变花样。就题材说，主要有这么几类：一是为教学需要而改写《外国建筑史》^{〔1〕}，压缩到30多万字，还为选修课写了一系列关于外国造园艺术的文章，汇成30余万字的《外国造园艺术》^{〔2〕}。二是写了一批有关文物建筑保护的文章，同时翻译了不少这方面的国际经典文献，后来选了一部分编成《关于文物建筑保护的国际文献》^{〔3〕}。其实，这也是为一门选修课而写作和编译的。三是走笔写了一些论文，比较集中的是苏联早期建筑思潮、外国园林和纪念性建筑的装饰雕刻这几方面，发表在一些刊物上。第四类比较特别，主要是一批论战性的文章。整个80年代，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关于文化传统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在建筑界也很热烈，我凑热闹参加了，零七八碎写了20万字左右，分散发表在一些刊物和报纸上。为了这场论战，我翻译了勒·柯布西埃的《走向新建筑》^{〔4〕}和

〔1〕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60年出版。

〔2〕 台湾明文书局 1990年出版。

〔3〕 台湾博远文化出版公司 1992年出版。

〔4〕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年出版。

金兹堡的《风格与时代》^{〔1〕}两本现代建筑的经典著作和《二十世纪欧洲各建筑流派的纲领和宣言》^{〔2〕}。还追随汪坦老师，编了一本《现代建筑美学文选》^{〔3〕}。这四大类之外，还写了些杂文，发表在各处，其中比较成系列的是10来篇书评，比较有风味的是几篇介绍外国名建筑的文章。

从90年代开始，我的写作进入第三个时期，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到中国乡土建筑研究上。原因是得到了一笔经费，我可以摆脱40年的纯书斋生涯了。这是我渴望已久的。可惜，我已经“发苍苍，视茫茫，齿牙摇落”，太晚了一点儿。关于乡土建筑的散碎文章已经发表了一些，正儿八经的要到今年年底才能出版一部。

《建筑文库》主编杨永生同志给我一个机会，出一本10万字的小文集。我本来打算选得杂一些，把我的工作全貌反映个大概。但是，一来是这套文库限定的篇幅太少，学术性文章都相当长，容不下，只好叫它比较集中在一个主题上；二来是凡我征询过意见的朋友，异口同声要我把10年论战的文章选编成书。他们的理由是，不论它们是好是坏，是对是错，也不论我现在对它们抱什么看法，它们是80年代建筑学界的一份史料，代表论战的一个方面。同时，我写的虽然是建筑，却不太陷入专业本身，往往从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下手，因此，可能会有其他

〔1〕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1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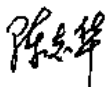
〔2〕 台湾城市改革者出版社 1992年出版。

〔3〕 春风文艺出版社和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9年出版。

领域的朋友们对它们有兴趣。

根据这些原因，我选编了这样一本小册子。我一向不敝帚自珍，那些零散的文章没有搜集整理，幸亏硕士生舒楠帮忙，才编成这本文集。也许还有些更应该入选的，没有找到。不过，作为史料，也差不多了。

这些文章，有一部分在发表的时候，被删改过，留下了创疤。主编建议我改回去。但年代已久，意兴阑珊，而且没有原稿，就只把前言不搭后语的地方理顺，把风格修复。文气不免差了些，拉倒了罢！



1992年7月盛暑于北窗之下

目 录

小序

一把黑布伞——纪念梁思成教师 85 诞辰 (1)

记国徽塑造者高庄老师 (4)

风格试论 (7)

北窗杂记之四 (29)

北窗杂记之六 (31)

北窗杂记之八 (33)

北窗杂记之九 (35)

创新散论 (37)

读书偶感 (41)

读书笔记——前进与后退 (46)

“寻根”及其它 (54)

建筑与社会生活 (70)

试析传统与遗产 (87)

为我们的时代思考 (93)

柯布西埃与住宅和现代建筑

——纪念柯布西埃诞生 100 周年 (102)

卢斯《装饰与罪恶》译后记 (116)

《走向新建筑》译后记	(119)
怎样保护北京的古都风貌	(134)
假古董危言	(138)
再说另一种假古董	(140)
“物唯求新”	(142)
也说“赶时髦”	(144)
曲阜的“巨资”	(146)
备课笔记——关于建筑艺术	(149)
建筑艺术散论	(163)
文士园林试论	(192)
外国造园艺术散论	(212)
读《明、清建筑二论》	(240)
谈文物建筑的保护	(250)
从风水书被禁说起	(261)

一把黑布伞

——纪念梁思成老师 85 诞辰

1947 年秋天，我到了清华大学，进社会学系学习。一个中学生，刚刚进大学，最爱听的就是关于教授们的种种传说，就象小时候仰望长空，听奶奶讲天上的星辰，一样的新奇，一样的入迷。

那时候的清华大学，简直象一个银河系，处处都是群星灿烂。有两颗星，因为成对出现，更加引起我们的注意，一颗是梁思成，刚刚被美国人请去讲学；一颗是林徽因，透明的诗人。

那时候的大学生，崇拜教授，也崇拜天才，当然更崇拜天才的教授。因为崇拜梁先生和林先生，我特别爱打听他们主持的建筑系的事。到了第二年校庆，一大早就跑到建筑系去看展览。走进系馆，第一件触目的东西是一句口号：“住者有其房。”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正在解放区成为事实，所以，“住者有其房”这口号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展览的那些设计图更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哦，这就是建筑学，它对普通人如此体贴入微，如此富有人情味。它既设计生活环境，也设计生活本身。建筑学，这是一个充满了生活气息的人道主义的专业。

我更加崇敬梁先生和林先生了。

到了 1949 年，社会学读不下去了，要转系，我就立刻想到转到建筑系去。

先得找梁先生。虽然在清华大学呆了两年，但我毕竟还是个不到20岁的小青年，要找这么一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大教授，心里还是很紧张。也不知为什么，我竟在正午到梁先生家去了。梁先生和林先生正在用午餐。于是，我更加紧张，急急谈了要求转系的愿望。自己直埋怨前言不搭后语没有说清楚，听梁先生问我，对建筑学有什么看法，我把在校庆展览会上想到的全说了。林先生很高兴，立即说：“好，好，太好了，建筑系欢迎你。”从社会学系转到建筑系，要把两年的学历全部丢掉。我问梁先生，是不是可以承认我的一些学分。梁先生说：“不要可惜这两年，你学的知识是有用处的，建筑系的学生本来应该多学些社会科学。”他停下午餐，跟我讲起住宅问题和城市问题的社会学来。我又说，数理化丢了两年，也许生疏了。梁先生叫我到教务处拿入学考试的成绩单来，如果数理化成绩比较好，就可以了。

我赶紧扭头就走。不料已经下雨。梁先生叫住我，说等雨停了再走，并且说：“已经赶不上食堂开饭了，就在这儿吃午饭罢。”一个毛头小伙子跟两位先生说了几句话，自己觉得不得体，浑身上下都不大对劲；听到梁先生这样说，反倒更加不知所措了。我慌慌张张弄开门，跑了出来。雨越下越大，跑到照澜院，已经一片白。正在进退两难，风声雷声中听到有人叫我，一回头，原来是从减同志追了上来，是梁先生叫他送来一把伞。

我没有接过这把伞，但看了它一眼，这是一把黑色的布伞。

几年以后，我向梁先生提到这件事，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只笑着说：“你为什么不用那把伞呢？”但那把伞倒是常常在我眼前出现，有时候，厌倦了教学工作，暗暗打马虎眼偷一点懒，那把伞就会敲打我，教我不敢。

1966年，梁先生被迫挂上黑牌，打着锣游街的时候，我也看到了那把伞。

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那把伞，黑色的，把柄弯一个钩。

（原载 1986 年 9 月 7 日《北京晚报》）

记国徽塑造者高庄老师

1949年秋天，清华大学建筑系（当时叫营建系）来了高庄教授。学生们都怀着好奇的心情等待他，因为早已听说他才华卓越，又非常严厉。

他来了，高高的个子，穿一身灰蓝色土布制服，宽松得有点儿晃荡。眼睛眯成一条缝，看不出是严厉还是慈祥。

他只开了一门课，木工。我们七八个小青年，第一次走进木工房，只见窗明几净，既没有刨花，也没有锯末，工具整整齐齐排了一溜。先生站在当中，用南方口音给我们讲课，慢慢的，还是不大好懂。每逢一句家乡土话说不明白的时候，就有点口吃，然后噢哟一笑。我们很快就学着他的口音说话，他很开心指着我们说：“你这个……。”于是我们大声叫着“凿孔孔”，“一眼眼”，再也不相信他是个很严厉的人了。以后，每到周末，我们就结伴到高先生家去，看他创作的绘画、雕塑和工艺品，听他讲解他收藏的小文物的美。

不过，他对工作倒确实是要求很严。推刨子，拉锯子，一招一式，都要动作到家，姿势正确。下课之后，我们不能立刻就走，必须把木工房收拾得干净整齐，象第一天进来时候的样子。有一次，一个同学从工地学来一句话，叫“干净瓦匠，邋邋木匠”，表示木工房不必那么整齐。高先生指着他的太阳穴说：“你这思想邋邋了！”

我们系老师们设计的国徽图案被政协原则上通过之后，请高先生塑造。他一向爱美爱得入迷，鉴赏力极高，而且眼到手到。再加上生性认真，从来不肯马虎，所以在塑造过程中，对图案有不满意的

地方，就不管不顾地“擅自”修改起来。幸亏系主任梁思成先生全力支持，一方面写报告向中央说明情况，一方面充分信任，决不干扰高先生的工作。我们这帮学生又一次对高先生产生了好奇心，嘁嘁喳喳地打听他做得怎么样了。多少日子之后，他带着满眼的血丝，右眼近乎失明，完成了修改和塑造。一看成品，全系的教师和学生没有一个不赞叹，但是除了给学生讲了一次课之外，他以后不再提起这件事。

不久，高先生离开了清华大学，随后就遇上了1957年的风波。

1960年，我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兼课，在食堂里遇见了高先生。这时候，他好象在模型车间当木工。我们一面喝盐汤，一面说些情况。他对几年来的遭遇很感到不公正，但对当木工却很有兴趣，高高兴兴对我比划他设计的一件改良农具。可是，当我说到班上几位同学也在1957年遭到不幸的时候，一生刚强的高先生流下了大颗的眼泪。为了掩饰，他笑了一笑，笑得很苦。

那以后，许多年没有高先生的音讯。

1971年夏天，我从干校回北京探亲，一天下午，无意中在中关村北面的大路上碰见了高先生。他这时候已经被送到茶淀农场劳改，因为师母生病才得了几天假回家看看。他心境孤寂而凄凉，对我说，他自己已经无所谓，但是一生收集的工艺美术方面的资料，散失了太可惜，希望能交给一个可靠的单位收藏。他问我，是不是可以送给清华大学建筑系。我说，建筑系已经被工宣队占领，摧残得濒于毁灭，原有的文物和资料都难保，再送些资料去也是白扔。我们都黯然。傍晚，天色灰灰，他独自向西走去，我邀请他到清华我家里休息一会儿，他低声说：“何必给你添麻烦。”

一晃又过了七八年。再见高先生的时候，已经是云开日丽。我们当年的七八个小青年，经历过千难万劫，再聚到一起，立即就决定去看高先生。好不容易打听到他的住所，我们敲开门，先生就在面前，高高的身子佝偻着，脸色苍白，听见一声“高师傅”，高兴得不得了。